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Cultures *and* Publicity

文化与 公共性

汪 晖 陈燕谷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99288

C53
51



学术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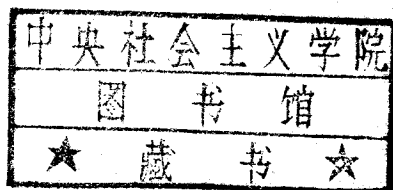
CULTURES AND PUBLICITY

文化与公共性

汪晖 陈燕谷 主编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134-4

I.文… II.①汪… ②陈… III.社会科学-文集 IV.C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599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
字 数	422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学术前沿

总 序

DI24/0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1 月

目

录

导 论	汪晖	1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汉娜·阿伦特	57
公共领域	尤根·哈贝马斯	125
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	尤根·哈贝马斯	134
吁求市民社会	查尔斯·泰勒	171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查尔斯·泰勒	199
《政治自由主义》导论	约翰·罗尔斯	221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		
基本理念	约翰·罗尔斯	240
承认的政治	查尔斯·泰勒	290
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	尤根·哈贝马斯	338

万民法	约翰·罗尔斯	376
什么是启蒙?	米歇尔·福科	422
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		
第三世界批评	阿里夫·德里克	443
没有边界的世界? 从殖民主义到		
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	三好将夫	484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	阿尔君·阿帕杜莱	521
批判的国际主义	李湛志	556
后 记	汪晖	601

汪晖

导论

冷战结束之后,为当代世界提供统一规划的抱负似乎只能由当代自由主义来承担了。但令人惊异的是,为柏林墙倒塌而欢呼的声浪尚未消失,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跨国资本、大众传媒、全球化等概念已经以密集的方式成为当代世界的关注中心。这些主题还经常伴随对“西方倡议民主与自由主义为普遍价值,维持其军事优势与促进其经济利益的种种努力”^[1]的谴责。对于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关注跨区域进程和全球体系的学者来说,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中,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鲜的问题,因为它们困扰人类已有数世纪之久。但仅仅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它们才从意识形态的严峻冲突背后凸现出来:那些刚刚为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欢呼“历史终结”的人们,不得不重新面对当代世界的新的历史挑战。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理论家从这些社会关系及其矛盾中发现了仍在延续的“历史”;而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则发现,较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当代世界围绕这些问题而出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诉求严重地冲击着自由主义的诸多前提,以至于像亨廷顿这样

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而当代的文化冲突则具有更为不可调和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阶级、财产权等问题在当代世界并未消失，却没有引起自由主义者的深刻不安；而当代理论所关注的族性、性别以及民族主义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而且也在民主法制国家内部激发了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进而导致了对现存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的严重质疑。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笼罩在“文化多元主义”这一笼统概念之下的部分权利诉求是从自由主义的平等政治中衍生出来的，但却对自由主义构成了极为尖锐的挑战。

本文主要是对当代自由主义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共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扼要地解释当代世界的新的变化以及当代不同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第二部分以泰勒和哈贝马斯为个案，研究民族国家内部关系中的集体权利诉求与个人本位的权利理论的矛盾。第三部分讨论自由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方面面临的困难，我选择了亨廷顿和罗尔斯关于国际关系的规范式研究作为这一部分的主要分析对象。第四部分试图从历史的视野分析“文化、市场社会与公共性问题”。简要地说，当代自由主义没有能力在一个同质化和异质化相互交织的世界里提供普遍主义的权利理论，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历史的复杂关系中分析“公共性”丧失的历史原因，理解“公共性”与“差异性”的相关关系，并提供平等政治的新视野。这种“公共性”曾经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反抗封建等级制的下层阶级的运动的共同前提，但在历史过程中却成为压制“差异性”的工具。换言之，“公共性”首先是对一切不平等

的等级关系的否定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肯定,而不应是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的命题: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東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摧毁一切争取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社会运动,以换取由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公共性”应该成为一种争取平等权利的战斗的呼唤。

本文是对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内在困境的分析,而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总体评价。当代自由主义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和取向,从而不可能在“自由主义”这一总名之下加以讨论。提出这一点,是为了避免对“自由主义”作简单化的讨论。

1. 全球化与差异政治

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构成了当代文化论争的中心问题。尽管性别问题与族性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但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它们都是一些亲和现象。“这些现象都是些解放运动,它们的集体政治目标主要是从文化角度确定的,虽然其中不乏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依附性等问题。”^[2]这些解放运动诉诸“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把西方中心主义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延续。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题为《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一文中概括说,“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3]一方面是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日益的全球化(左派的媒体研究经常从美国化或商品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寻求自主性的社

会运动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运动及其为获取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并不能够简单地化约为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它们的权利诉求是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展开的。它们既表现为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运动,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种族战争,前苏联解体并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等不同的诉诸民族自决原则的运动,也表现为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群体等边缘群体对他们的社会权利的要求。这些运动仍然诉诸启蒙运动以降日渐深入人心的平等原则,但他们对平等的诉求并不仅仅表现为追求普遍主义的平等权利,而经常是以保存差异性为目标,力图通过认同政治建构不同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从而把平等问题作为某种集体独特性的权利诉求。如果说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为先前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提供了平等的基础,它的那种抹平差异的平等概念对于这些新近发生的“承认的需求”则是十分陌生的。

冷战的结束把这些新的世界关系从意识形态冲突的阴影中释放出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关系不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的图景,三个世界模式、边缘与中心模式、移民理论、过剩与匮乏模式、消费与生产者模式等理论构架也不足以解释当代世界的复杂性。从总的方面看,离开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历史,我们就没有可能理解这些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的现象。当代世界的政治结构建立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全球互动关系之上,货币、贸易、征服和移民构成了15世纪直至20世纪的持久的跨社会纽带。这个进程由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转移和飞速发展而加快了速度(Bayly 1989),最终构成了一个以欧洲资本为中心并遍及整个非欧洲世界的复杂的殖民体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边缘

区域,并通过农业和矿业的生产而加入到全球劳动分工之中。概括地说,这一过程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形式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是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共同提供了“建构民族性”(想象的共同体)这一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运动(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erson 1983)的基本背景。^[4]按照安德森所谓“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说法,大众文学(mass literacy)在建构民族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直接的交流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问题的开始,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技进步,特别是交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人类抛入到“地球村”之中:传统的距离感被深刻地改变了,本土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含混了,于是理论家们开始探讨一种“能够解释这种无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阐明: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5]

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跨国化,从而最终导致民族国家的某些功能性变化。但是,在分析这一过程时应该防止过分地夸大民族国家的衰亡。在我看来,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没有发展出与之相应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民族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地干预当代的经济过程,并把自己看作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的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民族国家衰落了,不如说民族国家正在改变其传统功能,全面地介入当代世界的社会关系。然而,现代世界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明显地改

变着民族国家的含义,这一过程与民族国家的自觉的功能调整完全一致。如果把非领土化政治看作是当代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特点的话,那么,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nations)与国家(states)的前所未有的敌对关系之中。“一方面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民族性观念的群体)力争夺取或共同掌握国家和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国家也力争夺取并垄断民族性观念(Baruah 1986; Chatterjee 1986; Nandy 1989)。一般而言,跨国分离主义运动,包括那些使用恐怖手段的运动,体现了民族对国家的追求:锡克族、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巴斯克人、摩洛人、魁北克人,他们代表着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既要力争创造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渴望瓦解现存的国家。另一方面,国家也不甘示弱,它总是力图垄断共同体的道德资源,要么干脆宣称民族与国家体用不二,要么系统地展示遗产政治(heritage politics),将所有群体尽收网底,这些伎俩在世界各地似乎全部如出一辙(Handler 1988; Herfeld 1982; McQuineen 1988)。”^[6]从边缘区域向中心地区的人口迁徙既可能造成对母国的强烈的批评意识,也可能产生对于母国的依附意识,阿帕杜莱断言“非领土化现在业已是全球原教旨主义的核心”。^[7]在非领土化的过程中,不仅货币、商品和人口在世界各地展开无休止的追逐,而且电影公司、艺术经理商和旅行社也从这种非领土化人口与母国的联系中找到了商业的契机。他们用形象的方式重新构筑出想象的、很可能是支离破碎的母国形象,但这些形象却可能产生新的导致族群冲突的意识形态图景。阿帕杜莱没有讨论的是非领土化过程可能导致的新的文化要求:移民群体在所在国家提出的平等尊重的集体性需求。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某些当代文化研究经常把民众的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以及分离主义运动混为一谈,但它们并不是

一回事。民族运动的榜样一直都是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共和政体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指具有相同历史命运的民众把自己看作是拥有相同种族、相同语言的集体。他们的认同不仅表现为出身相同,也表现为他们都是具有政治行为能力的国家公民。换言之,民族主义乃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之一。^[8]然而,正如三好将夫指出的,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许多其它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sm)的表现。他引用《国际新经济》的说法,这些独立运动是“作为一种政治统一力量的民族主义生命力日渐衰落的反映,而民族主义的衰落的原因则是经济与政治的国际化。”^[9]因此,我们不当把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简单地看作是民族主义的复兴,而应该把这些运动同民族国家的功能转化联系起来考虑。^[10]

当代世界的非领土化过程是和跨国的生产和贸易过程同时发生的,它并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而是近代世界结构变化的历史延续。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把跨国公司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关联起来,并从这样一个视野观察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如何从民族国家的利益转向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整体结构;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延续,但旧殖民主义需要借助国家、族群和种族的名义,而跨国公司则倾向于非国家性(nationlessness),其表现形态不仅是使各个不同的地区日益陷于同质化的命运,而且还唤起特殊的族群主义用以掩盖背后的经济关系。如果殖民主义者是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中找到了制定政策的道德基础,那么全球结构的变化不仅会改变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威胁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设计及其道德基

础。^[11]民族国家的衰落密切地联系着工业化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世界结构的转换因而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丧失了权力,相反,这仅仅意味着他们运用的逻辑、他们为之效力的委托人、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占据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已。^[12]随着多国公司向跨国公司的转化,公司逐渐斩断了与母国之间的纽带,为了自己的利益,它可以剥削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的母国。因此,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可能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弱化国家认同,而且还创造了一个能够在世界各地流动的、具有多元种族结构的、能够使用英语的专业人员阶级。^[13]“在清除了国家和种族方面的累赘之后,跨国阶级也无法摆脱一种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有效地管理全球生产与消费,以及世界文化本身。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同跨国公司结盟并成为它的辩护士呢?”^[14]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诉诸认同和差异的族群政治就不过是一种原质主义悖论:构成一个族群的原质(*primordia*)——无论是语言还是肤色,邻里关系还是亲缘关系——早已全球化了,从而诉诸原质的族群政治不过是一种建构。因此,族群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源自某种特殊的传统,而是源自对这种特殊传统的建构。那么,这种建构活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阿帕杜莱虽然拒绝在文化与经济之间作出一种决定论的解释,而把问题归结为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力量之间的断裂、脱节及其无休止的流动,但他对问题的基本把握仍然是建立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理解之上的。在他看来,作为当代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特点的跨国化的生产过程仍然被掩藏在国民生产率和领土主权等传统幻觉之下,从而跨国化的生产关系恰恰被区域性或民族国家等偶像遮盖了。^[15]阿帕杜莱从

人种图景 (ethnoscapes)、媒体图景 (mediascapes)、科技图景 (technoscapes)、金融图景 (finanscapes)、意识形态图景 (ideoscapes)等五个维度描述全球的文化流动,显示了力图复杂地把握当代世界图景的努力。^[16]他使用“图景”(scape)这个后缀用以表示这些图景的不规律的状态,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征。如果说人口的迁徙、科技的发展和金融的流动不断地冲破民族国家的藩篱,那么,媒体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应的特征。他特别重视的不仅是这些图景的流动性,而且是它们相互之间的断裂和脱节:它们之间的关系无法预测,每一图景不仅都受到其自身的限制因素和刺激因素的制约,而且每一个图景的变动都对其他图景构成一个限制因素和运动参数。因此,这些图景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构成一个简单的、机械的全球基础结构,而折射出这些断裂的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也具有了相应的特征。例如,意识形态图景经常涉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旨在取得国家权力或部分权力的政治运动的反意识形态,其中少不了的是“自由”、“福利”、“权利”、“主权”和“民主”这些关键词。如果说在欧美启蒙叙事中这些术语和形象具有一个内在统一的意义结构,那么,在全球性的流动中,这种意义结构已经松动了,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群体正在具体的语境中组建自己的政治文化。

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国家的衰落(或功能转变)、族群政治的兴起看作是资本运行结构的变化的表征,他们拒绝文化多元主义论证所包含的那种具有重要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主义。德里克断言“后殖民主义转移了对当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统治形式的关注,并且模糊了它自身与其发生条件即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论在现象上显得多么支离破碎,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依然

是全球关系的结构原则。”^[17]换言之,为什么欧洲中心主义能够规划现代的全球历史,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抱负和全球历史的终结,而其它地区的种族中心主义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显然是把作为欧洲霸权的基础及其全球化动力的资本主义置于考察近代历史的中心地位,而不是把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是起源性的东西。

“全球资本主义”的范畴清楚地解释了民族国家的功能转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条件,但这种解释方式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是过分地将文化、种族和性别的诉求化约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坚持异质性、差异性和历史性,坚持一种从局部到全球进行概括的倾向,这一点并非没有历史理由。关键的问题是:种族、性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不是漠不相关的问题,这些因素本身直接地参与现代世界的社会分层。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国家,种族、性别本身甚至是决定经济政治地位的直接因素,而支配和影响这种社会分配的正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是基础性的、总体性的关系,但是,这一基础性关系与各种政治和文化诉求的关系却不会那样的简单明了。正如过分地用文化关系解释政治经济关系可能掩盖了社会冲突的深层动因,把各种社会和文化冲突化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同质化现象也明显地简化了当代世界的复杂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后殖民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后殖民知识分子还是力图将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的批判区分开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后殖民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回避了资本主义这一基础范畴,从而把自己创造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那么,建立在后结构主义基础上的后殖民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则认为

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元叙事。^[18]后殖民论述在揭露东方主义将殖民地建构为它者的同时,坚持差异性的原则,反抗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同质化,在学术史和方法论的层面注重知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关系。

在这样一种复杂而流动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共识”、创立规范、为“权利的平等”奠定哪怕仅仅是理论的基础也是极为困难的。这不仅因为在当代语境中,这种“平等权利”经常表达为难以平衡的集体性要求,而且还因为在“文化差异”成为关注中心的时代,权利平等的理论难以找到即使是在抽象的层次上能够统一的基础范畴,如传统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体。自由主义不仅是以民族国家的法律结构来体现自己的规范,而且也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论证自身的普世价值的前提。然而,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即使不是彻底的、也是深刻的挑战。我把当代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族性、性别问题提出了保存某种文化和群体的特殊性的诉求,从而构成了对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挑战;

第二,民族国家的变化和全球互动关系的复杂化造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自由主义的危机,它不得不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关系中论证自由主义原理的正当性,亦即论证权利平等的可能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关系角度提出的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从未消失,但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中获得了新的含义,即跨国资本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中建立的新的不平等模式。

当代自由主义刚刚还沉浸在“历史终结论”的兴奋之中,却迅速地感觉到了较之以往更为深刻和严重的危机。在上述三项